

人民军队在这里铸就军魂

——三湾改编纪念碑碑文敬读

□ 樊伟伟 姜凯峰

地位作用，对始终铸牢人民军队的军魂具有时代启迪意义。

力挽狂澜重塑新型人民军队

1927年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攻占长沙计划受挫后转兵南下。9月20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从浏阳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开始了创建农村根据地的伟大斗争。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时，原有50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千人，处境艰难，士气低落，军心不稳，逃跑成风。当时，党的组织主要建在团级以上单位，基层的组织不健全，无法切实掌握部队。

在行军路上，毛泽东一路调查研究，整个队伍中唯一一个没有逃兵的连队，吸引了他的目光。这个连队由党代表何挺颖所带，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毛泽东问，部队为什么抓不住？为什么逃兵这么多？何挺颖回答，主要原因是连队一级没有党的组织，党的影响没有渗透到队伍中去；党员太少，又没有捏在一起，形不成力量。

何挺颖的回答引起毛泽东的深思并寻找解决办法。9月29日晚，在“泰和祥”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次日，在村头的大枫树下，毛泽东宣布措施：将原本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改编后去留自愿；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在团、营、连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

三湾改编，使党的领导延伸到了人民军队的基层，铸就了人民军队建军之魂、立军之本。罗荣桓后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

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

新型人民军队从这里起步

三湾改编的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并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

保证了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三湾改编中，废除了旧军队雇佣制度，向部队讲清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同国民党旧军队的本质区别，通过“革命自愿”的原则整编部队，解决起义部队散乱和头重脚轻的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了军队的面貌，使队伍更精干、更纯洁。90多年来，这支新型人民军队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正是靠着坚决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

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先河。毛泽东认为，要保证党对起义军的坚强领导，就必须把支部建在连上。三湾改编在班、排建立党小组，各连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这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半个月后，在湖南酃县水口镇叶家祠阁楼上，毛泽东亲自发展6名新党员，成为“支部建在连上”的首次实践。此后，党支部在巩固中加强，成为统一领导和团结的坚强战斗堡垒。

形成了官兵一致、发扬民主的优良作风。三湾改编前，部队主要沿用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存在不少问题。三湾改编中，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官兵待遇平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在党支部指导下进行宣传、



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领导士兵的文娱生活，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由于建立了民主制度，使部队内部形成了一种新型官兵关系，架起了党武装士兵、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极大地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为夺取武装斗争胜利开掘了力量源泉。

90多年来，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不断发展、日臻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严密、行之有效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包括：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实行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实行党委（支部）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实行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切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提供了坚如磐石的政治保证。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 徐 黎

起开荒生产，自己劳动，自己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得自己干。他鼓励学生“和牛马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稷棉下工夫”，去艰苦的乡村和偏远的地区为农民办教育，做农民的知心朋友。

1939年7月，陶行知又在重庆北碚创办育才学校，招收有特殊才能的战争难童。育才学校实施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学校的戏剧组、音乐组多次在重庆演出，美术组还在重庆举办多次画展，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周恩来、邓颖超曾专程访问育才学校，周恩来为孩子们题词“一代胜似一代”。

从人民教育家到共产主义战士

陶行知生命最后的十年是跟着共产党走的十年。周恩来称赞他“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加重，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迅速转向建立文化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1935年12月，陶行知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八项抗日主张。之后的两年时间里，陶行知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远赴欧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推动各国成立华侨救国会。其间，他还拜会进步团体，广泛结交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和帮助。他通过自己的导师杜威，联络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拉·甘地等世界知名学者和政治家，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日

本侵略中国的态度》，“提议各国人民组织志愿的抵制日货运动，拒绝出卖及运送军火往日本，停止一切足以帮助日本侵略政策的对日合作”。

1941年3月，陶行知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联合文化界进步力量，支持共产党全民族抗日主张，呼吁加强国内团结，同国民党专制政治进行斗争。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人同声相应，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共产党人接触，通过书信、电文往来和工作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深信只有马列主义是真理、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振兴的希望。

在他生命最后的100天里，他依然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奔走呼号、举旗呐喊，光演讲就达100多场。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在上海终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辞世。延安、重庆、上海以及美国纽约等多地为他举行了纪念活动。陆定一在延安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肯定陶行知在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救国会的政治立场，并发出号召：“二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也要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

从知行到行知

陶行知将教师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他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他深知找到自己所为之来的大事

并不容易，为此他一辈子都在执著而坚定地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甚至为此改变自己的名字。在南京金陵大学求学期间，陶行知笃信“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此，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陶知行”。

回国后，陶行知发现要在中国实行实验主义教育理论并不容易，于是写文章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他先赞成王阳明的思想，又批评其“先知后行”，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创办晓庄师范时期，陶行知在自己的办学实践中不断剖析旧传统教育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民众的弊端，他在学校里不断演说自己关于“先行后知”的观点，以致许多调皮的学生称他为“行知吾师”，他也就乐得把自己名字改作“陶行知”。

在创办了自然学园、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后，陶行知很快认识到不仅要“从行到知”，更重要的还要“由知到行”，于是提出了“行—知—行”理论。这也很好地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正确地分析和处理了教育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要使教育为振兴中华服务。

陶行知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正是陶行知一生的写照。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甘于俯身走入平民之间，为他们服务，将自己的全部都投入到大众教育中去，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般为教育事业辛苦一生，这背后若无彻底的谦和与决心，是断不会如此的。



夜兼程、跋山涉水向东北疾进，用双脚与毅力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轮船、汽车、火车比速度、争先机。一路之上接到中央一封又一封的加急电报，不停地询问行军情况，要求干部团加快行军速度，能早到一天是一天，能早到一人是一人。有一次收到党中央急电：星夜兼程！星夜兼程！星夜兼程！干部团恨不得肋生双翅、脚下生风。

关山万里，路途遥远，一路坎坷，行军艰苦，超乎想象。到达承德前几乎都是步行，多是狭窄难行的山路，每天要走100多里，有时还要急行军，有一次连续行军一天一夜，走了150多里。有时累得连衣服脱就睡着了，衣服烤着了也浑然不觉。脚底板打满了水泡和血泡，捅破放了血水继续走，化脓感染了，每走一步都要强忍痛苦。夜间行军为了不掉队，就互相拉扯着衣角边走边睡。在经过海拔2000多米的摩天岭时可谓惊险，山上烈日炎炎，山下大雨倾盆，走到半山腰时，已是汗流浹背，又渴又饿又累。到达山顶天已经黑了下來，队伍只能摸黑下山，一不留神就会滚下山去摔得粉身碎骨。队伍只能单行，后面人听着前面人的脚步声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走，直到半夜队伍才下到山下。

一路上凶险四伏，干部团冲破了层层封锁。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战争状态依然存在。阎锡山、傅作义等部的国民党部队对干部团进行堵截，政治土匪也时常打冷枪进行袭扰。出于安全考虑，干部团往往要绕行很多路。通过危险地带时，对女同志、患病和体弱者都要提前编好互助组，以备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两人挟一人强行通过。在小石口村遇到了应县来的敌军，为了甩掉他们，干部团强行军一天一夜，当天夜里有10多名干部失踪。在承德登上火车时，国民党特务在车底安放了炸弹，幸亏发现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挺进东北的干部大多数都到沈阳集中，然后由东北局统一分配。因为任务紧急，许多人连招呼都来不及打，接到命令背起背包就走。1945年11月15日深夜，经过70多天的行军，延安干部团胜利到达北安，跨越了8个省，总计行程8000多里。这是延安干部团中行军距离最远的一支。一部分干部继续向北挺进，一直到达最北端的漠河，总行程超过1万里。毛泽东称挺进东北这一伟大行动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

巩固后方 胜利保障

当时，东北地区划分为九省，黑龙江地区被划分为五省一市，以北安为省会的黑龙江省是东北九省之一、黑龙江地区五省之一，也是全国最北部的一个省份，下辖20多个县。延安干部团的及时到来，给黑龙江省送来了大批优秀干部，使革命力量得到空前加强。虽然干部总数只有195人，但个个都是精英，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他们带来了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也发挥了核心骨干作用。这里由此成为北满根据地五大中心之一。

来不及洗去一路征尘，干部团成员就投入到紧张工作之中。到达当天，黑龙江省工委成立，紧接着省军区等重要机关也相继成立。在3天之内，所有干部全部分配到位，大部分都被分配到各县，大县分配七八人，小县分配三四人。在极端困难、危险的环境里，他们发扬“钉钉子精神”，将各项工作扎实开展起来。在省工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省完成了建党建政、建军剿匪、土地改革、支援前线等任务，将黑龙江省打造成为坚不可摧的红色堡垒和稳固有力的战略大后方，为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干部团到达北安，标志着第一批延安干部团进军东北的小长征基本结束，不仅使党中央的“先手棋”完美收官，抢占了战略上的先机，也使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得到坚决贯彻实施，初步完成了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布局。

万里关山赴北安

□ 刘淑滨 牛升海

抗战胜利后，为了创建东北战略根据地，党中央决定从延安抽调大批干部奔赴东北。这次干部大调动，万里迢迢，征途漫漫，是一次鲜为人知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小长征，也是“决定全国解放战争命运的关键点”至关重要的一环。

放眼全局 聚焦东北

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历来十分重要。这里背靠苏联，西与蒙古接壤，东南与朝鲜为邻，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毗连，进可攻，退可守，为兵家必争之地。东北资源丰富，盛产粮食，工业发达，交通便利，钢铁、煤炭、发电、水泥等产量均占当时中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是最为理想的战略基地。

抗战胜利前夕，党中央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东北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在党的七大上，提出要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反复强调东北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們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剧变，更加凸显出东北的极端重要性。东北谁属，事关重大，“四国三方”聚焦于此，角力于此。如果东北为我党所控制，不但便于争取苏联的支持，还可以将它与冀热辽和整个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使我方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在整体战略布局上赢得主动权。党中央认为此时正是争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因此果断作出迅速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中国革命也由此迎来重大转机。

为了实现这个重大战略转变，党中央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调兵遣将。挺进东北的延安干部团作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成员来自中央党校、中直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单位，共1000多人。他们政策理论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当中许多人是东北人，因为离开家乡多年，早已是归心似箭了。这次行动目标明确、动作迅速，从号召报名到组建干部团，再到整装出发，仅仅用了10天时间。

万里征程 艰苦卓绝

1945年9月2日这天，是延安干部团出发的日子。从早上开始，延安附近的沟沟岔岔便喧闹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像一条条汨汨流淌的溪流汇聚到一起。

这里没有离别的伤感，只有澎湃的激情。他们步伐坚定、昼